

# 智启善治：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图景\*

王 迪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 AI)时代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它以技术突破和应用发展为起点,逐步推动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共振发展。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逐步具备了更强的学习、推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从早期的专用智能(如图像识别、语音处理等)向通用人工智能(AGI)迈进。伴随这种变化, AI 技术走出实验室,迅速且深度融入医疗、金融、制造、交通、教育等多个产业领域,让数据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让算法成为生产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更切近日常生活的变化是,具备了“逻辑增强”和“自主决策”特征的人工智能,正在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渗透,引发社会系统的连锁变革:一方面,在消费、娱乐、文化、办公等社会场景当中,人类与 AI 的交互关系从工具使用转向协作共生(如 DeepSeek、ChatGPT 等成为日常助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以“创造性伙伴”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在绘画、音乐、视频制作、文本生产、学术研究等领域挑战传统认知和创作边界。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场景(如媒体与公共舆论、空间与权力关系、劳动与工作场所、角色与自我认同等)都是“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的,也是(人们)与数字技术共同构建的”。<sup>①</sup> 面对信息技术与社会问题深度融合的环境以及不断增长的社会风险,人工智能的应用是破解社会治理复杂难题的客观要求,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研究者与实践者都需要看到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实践与发展前景,关注人工智能对于创新治理理念、优化体制机制、整合多元主体、提升治理效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作用。

## 人工智能与超级流动社会的信息基础

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社会治理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原创,早在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便是以书册典籍为载体建构起来的社会信息框架和文字记录系统。从“里耶秦简”所代表的竹简木牍时代,到后世不同时期、形态各异的户籍黄册与鱼鳞图册,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始终伴随着对数据的重视与利用,这些工具共同构建起一套“数目字管理”体系。<sup>②</sup> 在非常时期,这套体系有助于实现“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史记·高祖本纪》)的目标;在常态化时期,则为编户齐民、赋役有据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种对数据和算法的早期探索,虽在技术和形式上与当代人工智能具有显著差异,但是将人口、土地、赋税等要素编码为可量化指标的信息体系和治理逻辑却一脉相承,不仅展现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智慧,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及至当代中国,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口普查数据库和经济统计系统的建立,经济与社

\* 本文系东湖高新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基地项目“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平台经济条件下县域青年的灵活就业研究”(项目号:23BSH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澳]狄波拉·勒普顿:《数字社会学》,王明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6—217页。

② 虽然黄仁宇对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的数据统计持不同看法,但这里还是借用他的“数目字管理”概念。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8页。

会诸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数据统计的体系化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近年来,部分地区和城市开始探索数字化治理平台,通过基础数据分析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初步形成了以数据驱动为内核的治理模式雏形。这一模式在相对静态的社会背景下是有效的,而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前中国社会的高流动性特征显著,主要表现为居住性人口流动(即“人户分离”现象愈发常见、租房比例攀升等)与职业性人口流动(即工作变更频繁、灵活就业及远距离通勤的常态化等)的叠加。这种高流动性打破了传统单位制和户籍管理的静态治理框架,导致原有信息采集机制(如户籍调查、周期性人口普查)难以有效追踪人口分布与社会需求,依靠基层以“敲门式”“地毯式”“运动式”等方式登记的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真、重复、效率低下等局限性,使得户籍管理与属地治理模式面临数据滞后与服务错位的双重挑战。同时,社会分化加剧了群体需求差异,居住区域与职业场景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从“统一管控”转向精细化服务,但传统数据报送机制难以呈现实时状况、响应多元诉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为破解高流动性社会的治理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依托物联网、智能传感器、移动终端等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可以准确采集即时性、痕迹性、多维度、全过程的数据,构建数据集成与协同治理平台。比如,通过城市交通监控系统捕捉通勤潮汐规律,结合租房平台数据来分析居住迁移和人口流动性等。这种来源丰富、能够记录客观发生的活动且难以篡改的数据采集机制,部分消除了居住性人口流动和职业性人口流动给传统治理带来的“底数不清、动态不明”的核心痛点,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奠定了区域性社会治理和职业性社会治理的数据基础。

在区域性社会治理方面,以北京市“接诉即办”经验为例,人工智能技术丰富和拓展了城市治理的“认知触角”。通过构建多模态数据采集网络,系统将来自12345热线、社区网格App、智能物联网设备等多渠道的内容进行实时记录和汇聚。这些信息包括诉求文本、活动时间、空间定位

以及监控视频的结构化数据等条目,能够精准立体地刻画出流动人口聚居区、职住分离带、公共服务盲区等社会生态图谱,从而推动政府跨部门建立涵盖产业、住房、交通等多种场景的社会感知系统,并为建立协同响应机制创造条件。这种全方位、全周期的痕迹数据,使治理主体得以穿透流动性社会的信息迷雾,掌握人口、空间、活动、服务、问题的真实情况,为科学决策和精准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职业性社会治理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追踪职业转换和劳动力流动趋势,动态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呈现劳动者的区域分布、职业分布、技能分布、薪资分布状况,从而辅助用人单位扩大选才范围,优化招聘策略。同时,借助算法加持下的信息发布方式,能够有效拓展劳动者接触到的岗位信息和资源选择边界,精准匹配灵活就业者与零工岗位需求,减少求职者面临的“关系依赖”“人身依附”“马太效应”等问题;更进一步,算法对劳动平台的优化,能够促进用工方式和劳动过程的透明规范,甚至可以实现工作任务的“多渠道服务交付”(Multi-channel Service Delivery),有效避免劳动者被过度剥削、劳动成果不被尊重和认可等问题。对于监管和服务部门而言,一方面,可以借助算法捕捉到的信息,触及范围不断扩大的劳动者群体,掌握他们的信息,了解他们的困境,把握他们的需求,从而解决传统组织无法接触职业群体也难以支持灵活就业和边缘就业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可以依托算法优化治理措施,制定监管框架和进行政策回应,完善相关行业特别是新兴行业的秩序。

在数据真实性与可追溯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AI赋能的社会治理方式可以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穿透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的数据壁垒。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流动的、自动生成的数据体系,AI能够清晰呈现社会生态的全貌与社群的底色,准确回答社会现状“是什么”的问题。这不仅为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信息基础,也是人工智能赋能超级流动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 人工智能与复杂社会系统的问题溯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而社会维度的复杂性相对

有限的时代,社会问题的成因较为明晰,前置条件与实际后果之间的传导过程也比较明朗,因此更容易在数据系统和分析模型中锁定自变量、因变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个体层面的“教育水平与收入增长”、组织层面的“奖惩机制与生产效率”、社会层面的“媒介宣传与社会情绪”、国家层面的“政策干预与人口增减”等。但是,随着社会复杂性、群体异质性、产业形态多样性、信息传播渠道广泛性的逐渐增加,传统的社会问题溯源模式面临显著困境:影响社会问题的变量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而人工调查时的变量设置受限于设计者的知识结构,必然存在认知盲区,难以还原真实状态,导致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变得混沌不明、模糊不清,很难找到治理问题背后的成因,更难以找到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由此产生的治理行为,往往是疲于应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看似“对症下药”,实则没有发现并清除病灶,治标不治本,更谈不上从社会治理体系的角度进行整体性建设和系统性优化。

针对这样的情况,人工智能技术有条件扩大数据分析的范围,深度挖掘社会规律,突破因果认知的边界,构建起社会治理的新范式。这种范式的基础是全领域、多维度的数据链接与融合:人工智能凭借前所未有的算力和算法,将政务数据、企业数据、物联网数据、交通监控、社交媒体、消费记录、环境传感器等多种异构数据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覆盖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数据融合体系。这种数据融合是跨领域的,使社会治理系统有机会发现传统调查难以察觉的因果关联,比如“城建领域—经济领域”(城市更新对夜间经济和灵活就业的影响)、“教育领域—就业领域”(涉及中小学招生的教育政策对本地“用工荒”程度的影响)等。同时,这种数据融合又是跨层级、跨系统的,智慧治理平台能够在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行为与社区行动之间捕捉到直接的关联,进而联通政府、企业、社区等多方治理主体,构建“数据共享—任务分发—协同处置”的网络机制,推动社会治理从“垂直管控”向“网络化共治”转型。

人工智能在分析“短链条”“单因单果”的社会问题时,可以初步揭示问题的显性缘由。但是,如果要深入把握社会运行的潜隐逻辑,进一步提

升社会治理水平,则需要对复杂系统的“长链条”“多因多果”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人工智能凭借深度学习和算法迭代,展现出对“超复杂系统”的驾驭能力。它能够结合过往与当下的社会数据,以“万物有联”的分析思路,跨越时间周期对“因果森林”进行探察。通过绘制复杂社会系统的逻辑推理图谱,人工智能可以识别人口流动的时空规律与社会需求的潜在关联,细致勾勒出具体社会问题的产生过程,并展现“蝴蝶效应”背后的形成机制和完整链路。

仍以区域性治理中对“接诉即办”所反映问题的处理过程为例。在城市老旧街区,经常面临因建筑渗水或设施损坏等情况而被居民反复投诉的难题,而传统的“被动维修”模式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借助“城市大脑”等大数据平台,政府部门可以引入AI技术,对住建、气象、交通市政、排水管网、卫星遥感等数据进行系统性挖掘和分析。通过这种方式,有可能发现“城市更新改造→渣土堆积→地表硬化→地下水位上升→建筑渗水”的隐藏因果链,进而有针对性地建设雨水调蓄池、部署智能湿度监测预警系统、建立跨部门数据协同平台;也可能发现“夜间经济补贴政策→渣土运输成本结构改变→违规运输激增→道路荷载分布异常→基础设施损耗加速”这一跨越经济政策、行业监管、市政工程等多领域的因果长链条,进而制定“合理调整补贴以消除违规运输行为”“跨部门数据协同预判交通影响”等治理措施。可以看到,治理主体借助AI深度挖掘多维度数据,将碎片化投诉转化为城市治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有机会破解“反复投诉—反复维修”的治理困局,从而实现从治标到治本、从单点处置到链路治理的转变。

同样,在职业性治理领域,人工智能正重塑劳动关系的监测与调控范式。面对零工经济中劳动关系模糊化、社会保障碎片化的挑战,AI可以在平台派单数据、网约车行驶轨迹、劳动者接单记录等数字痕迹中,梳理、分析并识别平台算法规则(如骑手奖惩机制、投诉审查机制等)与劳动者行为模式(如违反交规等危险行为高发路段)之间的关联,揭示算法权力如何形塑新型劳动秩序;还可以通过“派单件数预测偏差→临时用工激增→

新手操作失误率上升→工伤诉讼增加”的传导过程,发现平台用工规模动态评估机制的重要性。这种数据驱动的治理创新,既避免了传统科层制对新兴业态的规制滞后,又通过技术中介重构了劳动权益保障的实践路径,为高流动性社会中的组织治理和职业治理提供了算法解决方案。

这些治理方案虽然场景各异,但却遵循着相似的 AI 驱动逻辑:将空间、人口、经济乃至文化等变量综合纳入考量,通过深度挖掘因果规律,延长对社会问题的解释链条。据此可以发现链路中断裂或腐损的环节,精准定位社会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堵点,不仅能更精确且具象化地解释某些治理做法为什么会失败,还能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给出解决方案,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同时,这些方案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智能建议,在总体上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效能。

###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演进的趋势预测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在流动性的状况下,一切都可能发生,但一切又都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应对。这就导致了不确定性、无知感、无力感”。<sup>①</sup> 在充满流动性的复杂社会情境下,各种社会风险与意外后果不断出现,公共政策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呈现出愈发强烈的潜伏性和非预期性特征。比如,从长期来看,撤点并校的做法将如何影响教育成效、家庭决策、村庄人口、县域经济发展? 延迟退休政策会让家庭代际分工产生哪些新变化,进而如何影响年轻人的生育选择并改变人口发展趋势? ——这些问题在政策制定之初并不能被轻易预见和全面评估。这种动态演变中的不确定性,也迫切呼唤社会治理思路的转变:现代化的社会治理要有一定的预见性,用已知的要素推论未知的走向,从经验和教训倒逼的被动响应转向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主动预判,用“大医治未病”的眼光,不仅观照和诊断当下的社会问题,还要指向对未来社会的治理。

人工智能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对现状的动态化描述和对现象的过程性解释,更体现为模拟社

会运行,智能推演未知世界,对未来趋势做出预测,进而实现智慧社会的动态化治理升级。当前 AI 社会模拟技术的演进呈现两大趋势:一是真实投射。数字孪生技术推动虚实空间深度融合,实时采集全景式社会信息,汇聚个体、群体、公共服务等多维数据,构建社会系统的数字镜像和“平行剧本”,打造“映射现实”的大数据平台,以真实数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进行拟合,对未来走势进行推断和预测。二是虚拟推演。通用人工智能催生新的仿真环境,即创制大型语言模型(LLM)驱动的生成性智能体,以“云实验”的方式运行一整套虚拟仿真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Agent Society)。这就好比一个自成体系、内部自治的“三体”游戏世界,模拟并演绎人类行为、社会互动和经济活动,推演完整、流变、迭代的社会发展全过程,为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强大的实验平台。

人工智能社会模拟技术的应用方向之一,是识别并排除系统性风险,消除社会治理中可能存在的短期或长期隐患。以城市安全预警为例,2014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惨痛教训揭示了传统风险防控体系的局限性,而基于时空序列分析的智慧化预警平台,可整合卫星定位数据、基站信号密度、交通卡口流量等多源信息,构建人群聚集动态图谱。当特定区域人口密度超过安全阈值时,系统可自动触发分级响应机制,从电子围栏预警信息推送,到公共交通线路动态调整,再到应急通道智能开启,形成“感知—分析—预测—干预”的闭环机制和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

人工智能社会模拟技术的应用方向之二,是服务于公共政策制定,其核心逻辑是基于孪生社会、映射世界或仿真生态中的实验推演和显示结果,为治理政策的取舍与调整提供依据,从而改变“试点—推广(或叫停)”的传统政策试验模式,重塑治理决策范式。比如,“城市大脑”的交通模块基于每日处理的巨量出行数据,通过在线学习机制实现信号灯配时的分钟级优化,使政策迭代从周期性调整升级为持续性优化。类似地,要评估“网红”城市的文旅发展会不会给本地交通、酒

<sup>①</sup>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店、餐饮等领域带来超负荷压力,就需要借助手机信号捕捉、社会模拟、趋势分析、路线预演等方式,对流量撬动的群体流动方向、规模和后果进行预判,即对“投放多少流量→引发多大规模的客流→挤占多少资源→产生何种效应”的社会过程加以理解和模拟,形成预测模型。最终结合城市自身的资源条件和接待能力,对文旅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做出科学的、合理的决策。

人工智能社会模拟技术的应用方向之三,是在社会治理中智能分析群体现状,预测居民群体或职业人群的未来需求和可能发生的状况。在区域性治理领域,多模态数据能够整合构建主动式需求评估体系。比如,基于社区出入记录、医疗信息系统及智能穿戴设备的动态监测数据,AI系统可以运用算法模型解析独居老年群体的行为轨迹与健康信息,预先评估照护需求与就医需求,建立健康风险分级预警机制,实现从异常状况识别到主动上门干预的服务闭环。又如,同步整合社交媒体舆情、政务热线及司法平台数据流,通过文本挖掘与时空聚类技术,分析投诉和诉讼案件的聚集特征,识别矛盾焦点分布规律,预测社会情绪演变周期,预防群体性事件,实现从“接诉即办”“事后处置”到“未诉先办”的治理升级。在职业性社会治理层面,AI能够辅助平台企业或相关政府部门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与服务优化。比如,通过对轨迹数据建模分析灵活就业群体的工作模式,可以系统识别配送网络中的“堵点”,精准定位服务覆盖的盲区。借助路径优化算法重构资源配置方案,既能够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度与前瞻性,还能有效降低灵活就业群体与社区物业、楼宇保安发生冲突的风险,从而实现劳动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双重增进。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沿着“描述—解释—预测—干预”的路径持续进化,将告别“先试错后治理”或“边试错边治理”的模式,以防患于未然的姿态,打造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体系。随着AI技术的完善,这套体系在过程模拟、风险识别、政策预演、需求研判等方面的能力会加速提升,实现从危机应对到风险预防、从局部优化到全局统筹的质的飞跃,在预测性和前瞻性的意义上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

## 社会治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要求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不仅意味着技术工具的升级,也预示着社会治理思维和范式的根本变革。社会治理不再以牺牲社会活力的方式进行管理、约束或压制,而是致力于了解与理解,实时感知社会心跳、把握时代脉搏;各方治理主体不再以“数字孤岛”的方式画地为牢、各自为战,而是力求突破传统部门管理的条块分割,从整体上改善社会生活状况、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社会福祉;治理目标不再局限于当下,而是“风物长宜放眼量”,既要解决短期问题,也要防范社会体系在更长周期内的运行隐患。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对社会治理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反过来,社会治理思维和目标的更新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从价值内核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己任。当下的AI应用方向引发了人们的调侃和反思,比如,曾有人戏言:“本来想让AI帮我们洗碗扫地,我们就有空去写诗画画;现在AI开始写诗画画了,而我们还在洗碗扫地。”这种调侃提醒我们,发展技术不是为了技术进步本身,更不是为了少数人“炫技”,技术进步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人民生活、释放人民活力、激发人民创造。同样,人工智能的治理应用须警惕落入“数据至上”“技术控制”“工具理性”“人类异化”的陷阱,而应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前提下,提升人民群众对智能社会的治理参与感、科技体验感、民生获得感、群体归属感和内在幸福感,筑牢社会治理的韧性根基。

第二,从组织方式来看,人工智能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需要专业协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是经济、社会、技术和伦理都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这不是技术独舞的时代,而是多种社会治理主体共舞的时代。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讨论权,不是自然科学的专属,更要体现人文关怀与社会科学的视角与经验;社会治理也绝不能落入技术中心主义和技术霸权的陷阱,而要体现多元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技术治理的未来方案制定,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需要,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战略

布局,在党建引领的前提下,统筹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由技术专家、行业代表、社会科学家和伦理学者进行跨学科协作、共商式设计,结合不同的行业方向和专业领域的意见,形成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路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和变革方向如何确定,需要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不仅是使用性参与,也包括表达性参与、改良性参与、监督性参与,以此增强 AI 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共同识别和防范 AI 技术可能带来的失控风险与群体伤害。

第三,从发展保障来看,人工智能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前提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各行各业都在大谈算力、算法、大模型的今天,要注意防范 AI 算法因数据来源不足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警惕因互联网世界中语料信息的良莠不齐、各种现存数据的真伪难辨,而产生的“AI 胡诌”“以讹传讹”“假数真算”等误导现象;更要避免将数据采集的任务转化为基层工作的负担和压力,让人工成为智能的“肥料”,加剧基层倦怠。社会治理需要人工智能作为“神经中枢”,需要智慧平台、数据中台等“城市大脑”的运算处理、分析决策,而中枢和大脑的作用发挥又依赖于包括基站、传感器、物联网等在内的一整套采集、传输、存储数据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全面渗透。由此获取的“数字数据客体”(digital data objects)<sup>①</sup>具备了即时性、真实性、独立性、不可篡改性等一系列特征,从而能够确保数据来源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实现对社会运行真实状态的全面映射——这是人工智能得以发挥治理效用的关键底牌和发展保障。

第四,从制度监管来看,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与审查机制需要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既是治理工具,也是治理目标和治理对象,它所带来的算法偏见、信息茧房、意见极化、数据滥用、隐私泄露和监控过度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担忧。这些虽然在此前的数字化时代就已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随着人工智能对数据整合能力的增强、对信息覆盖范围的扩大,且采用立体化、历时性、无感沉淀式的内容获取方式,当然要求治理规则与技

术同步进化,须对人工智能进行全维度、不间断、高敏感度的伦理审查、制度监管和公平性评估。与人工智能算法超越时空的特点相匹配,对人工智能的审查和监管也需要打通领域、跨越地域、贯穿周期,形成全景式、全过程的 AI 伦理框架体系,避免出现只考虑自身和当下的业务领域、不注重长期或其他领域行为隐私之类情况出现。

第五,从愿景目标来看,技术进步营造的是人机协同、人机共生的社会治理生态。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关于“劳动替代”问题的恐慌。AI 确实会导致部分传统行业(如制造业、运输业)岗位减少,同时催生新兴技术岗位,加剧技能错配和结构性失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不应是减少劳动投入、替代人的主体价值,而是从机械性劳动中部分解放人力之后,带来人类劳动投入方向的变化。当人工智能体可以替代人类完成标准化、流程化、高重复率的窗口工作、文字工作、计算工作、生产工作之后,如何让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投入到人性化、个性化、沟通性的服务以及面对面、提供情绪价值的交流中去?当高度发达的系统和算法可以代替人把事情“做完”,作为有经验、有直觉、有感情、有审美的人类能否通过制度设计、文化创新等创造性劳动把事情“做好”“做精”?比如,考虑不同的群体状况,让冰冷的代码、文本、流程更有价值温度,或者用人类偏好、共情能力和生活体悟让智能产品更宜人、让机器人看起来更亲和,等等。因此,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可以塑造“人性为魂、技术托底”的社会运行范式,构建人机交互、彼此激发、协同相宜的智慧社会治理生态,推动治理模式从“解决问题”向“预见需求”、从“管理控制”向“生态培育”跃迁,真正实现人类文明与智能技术在价值层面共鸣共生、在行动层面共建共治,为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之路贡献独特且可行的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王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

① [澳]狄波拉·勒普顿:《数字社会学》,第28页。